

湖北省社会科学院主办

第18辑

三农中国

宋亚平 主编

SAN NONG ZHONG GUO



- 马社香 毛泽东为什么提倡农业合作化
- 李培林 从“农民的终结”到“村落的终结”
- 王 会 乡村治理中的“不得罪”逻辑
- 曲延春 论中国乡村治理中的协商民主
- 陈怀远 对当前农村社会心态的评估
- 刘放生 奥秘深藏在农村城市化的进程之中
- 邓宏图 农村的出路在于组织
- 吴 象 农村改革的“总参谋长”杜润生

三农中国

SAN NONG ZHONG GUO

第18辑

宋亚平 主编

 长江出版传媒
© 湖北人民出版社

鄂新登字 01 号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三农中国.第18辑/宋亚平主编.

武汉:湖北人民出版社,2012.8

ISBN 978-7-216-07334-9

I. 三…

II. 宋…

III. ①农业经济-研究-中国

②农村经济-研究-中国

③农民问题-研究-中国

IV. ①F32 ②D422.64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2)第 206422 号

(请封面泥塑作者与我社联系稿费事宜)

主 编 宋亚平 项目负责人 窦鸿潭

执行主编 马德富

三农中国 第18辑

宋亚平 主编

出版发行:  长江出版传媒
© 湖北人民出版社

地址:武汉市雄楚大道 268 号

邮编:430070

印刷:武汉汉邦彩色包装印制有限公司

经销:湖北省新华书店

开本:787 毫米×1092 毫米 1/16

印张:10

版次:2012 年 8 月第 1 版

印次:2012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

字数:146 千字

定价:16.00 元

书号:ISBN 978-7-216-07334-9

本社网址:<http://www.hbpp.com.cn>

编辑部邮箱:hbskysnzg@126.com

hbpp1502@163.com

目 录

- 马社香 毛泽东为什么提倡农业合作化 / 3
- 李培林 从“农民的终结”到“村落的终结” / 25
- 陈怀远 对当前农村社会心态的评估 / 32
- 刘 奇 中国农民的迷茫与困顿 / 37
- 黄佳豪 农村养老“三驾马车”的困境与突围 / 47
- 王 会 乡村治理中的“不得罪”逻辑 / 53
- 曲延春 论中国乡村治理中的协商民主 / 62
- 李中建 我国农民工政策面临的挑战 / 69
- 郭晓鸣 张鸣鸣 新生代农民工社会管理的难点与对策 / 75
- 郭庆松 破解农民工市民化难题的“顶层设计” / 81

黄 健 农民为什么不愿意合作 / 91

胡海军 上访,一个无法求解的命题 / 97

刘放生 奥秘深藏在农村城市化的进程之中 / 103

陈俊梁 陈 瑜 苏州农村“三大合作” / 113

李克军 农村“集体经济”的新走向 / 121

邓聿文 中国城镇人口大于农村人口的意义与挑战 / 128

邓宏图 农村的出路在于组织 / 132

吴 象 农村改革的“总参谋长”杜润生 / 143

林明理 纪念我的农民父亲 / 152

目 录

- 马社香 毛泽东为什么提倡农业合作化 / 3
- 李培林 从“农民的终结”到“村落的终结” / 25
- 陈怀远 对当前农村社会心态的评估 / 32
- 刘 奇 中国农民的迷茫与困顿 / 37
- 黄佳豪 农村养老“三驾马车”的困境与突围 / 47
- 王 会 乡村治理中的“不得罪”逻辑 / 53
- 曲延春 论中国乡村治理中的协商民主 / 62
- 李中建 我国农民工政策面临的挑战 / 69
- 郭晓鸣 张鸣鸣 新生代农民工社会管理的难点与对策 / 75
- 郭庆松 破解农民工市民化难题的“顶层设计” / 81

- 黄 健 农民为什么不愿意合作 / 91
- 胡海军 上访,一个无法求解的命题 / 97
- 刘放生 奥秘深藏在农村城市化的进程之中 / 103
- 陈俊梁 陈 瑜 苏州农村“三大合作” / 113
- 李克军 农村“集体经济”的新走向 / 121
- 邓聿文 中国城镇人口大于农村人口的意义与挑战 / 128
- 邓宏图 农村的出路在于组织 / 132
- 吴 象 农村改革的“总参谋长”杜润生 / 143
- 林明理 纪念我的农民父亲 / 152

毛泽东为什么提倡农业合作化

——与陶鲁笏同志的对话

马社香

要了解毛泽东当年为什么大力提倡农业合作化,必须注意两点:第一要回到当年,实事求是;第二要尽可能了解毛泽东当年在这个举国大计上的远大目光、发展思路和辩证思想方法。多年来,笔者对陶鲁笏同志进行了长期跟踪访谈,本文内容源自2008年7月19至29日采访陶鲁笏的记录,2009年12月底核证于陶鲁笏和夫人贾于慈同志。现将本文公开发表,以寄托对陶鲁笏同志的追思,同时加深对我国农业合作化运动史的研究。

笔者:岁月如梭。陶老,现在您是毛泽东多次主持合作化书记会的主要见证者,当年毛泽东为什么大力提倡农业合作化?多年来各界众说纷纭,莫衷一是。您怎么看这个问题?

陶老:这些年来我一直在思考这个问题。要了解毛主席当年为什么大力提倡农业合作化,必须注意两点:第一要确实回到当年,主要是1951至1956年,实事求是;第二要尽可能了解毛主席当年在这个举国大计上的远大目光、发展思路和辩证思想方法。我从五个方面对毛主席为什么大力提倡农业合作化予以回顾。

一、避免两极分化和资本主义,强调走社会主义集体化道路

陶老:去年我们已经谈过,山西首批农业合作社的问世,先被华北局和少奇同志质疑批评,后得到毛主席支持的整个过程,我写过《山西试办全国首批农业合作社的前前后后——陶鲁笏访谈录》的文章,发表于《党的文献》

作者单位:武汉市社会科学院历史所。

2008年第5期,同年被《新华文摘》第23期全文转载。这里就不重复了。1951年夏,毛主席为什么支持刚刚萌芽的山西农业合作社?我们就从这里进一步回忆和探讨吧。

当年农业合作化宣讲材料认为,大力提倡农业合作化是毛主席把握了5亿农民发展的方向。这无疑是对的,但还不够深刻。其实毛主席从中央苏区时就深刻认识到,我国是一个一穷二白的农业国,几千年来小农经济不断地复苏、两极分化、破产,周而复始,没有出路。新中国只有扶持农业合作社中的社会主义因素,鼓励农民走集体化道路,才能避免两极分化和资本主义,过渡到社会主义。这也是毛主席当年支持山西农业合作社的根本出发点。关于这一点,当年华北局第一书记薄一波同志1953年9月传达毛主席过渡时期总路线的讲话,有很精彩的讲解。

毛主席说,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,叫过渡时期。过渡时期做什么事?两件事:工业化、集体化……要把一万万户农户变成集体化是艰巨的。一部分农民怕负担,怕当兵,怕共产。富裕中农搞互助合作是不容易的。中心问题是怕集体化。农民的负担是重的。中国历史上,贞观、开元、康熙、乾隆之治,是为而治,不能根本的解决问题,过上若干年,农民又要暴动。

在(农业合作化)这个问题的认识上,两条道路的斗争是很明显的。华北局在这个问题上犯过原则性错误。“七一”文章(在此指1951年6月29日薄一波在《人民日报》发表的《加强党在农村中的政治工作——纪念中国共产党三十周年》一文)文中根据刘少奇的谈话精神,不指名地批评了山西省委,是有错误的。互助合作是生产社会主义因素(引自陶鲁笏1953年9月27日华北局会议原始记录笔记)。

毛主席正是对整个中国历史有深透的了解把握,才紧紧抓住了中国几千年历史的一条主线,小农经济发展必然走向两极分化,最终逼得农民走投无路,起来造反,推翻旧王朝;新王朝生产模式依然如故,周而复始,没有出路。北洋军阀和国民党的统治,都在土地所有制和生产关系方面没有任何改变。共产党领导下的新中国,要彻底避免和根除这种现象产生和发展,就要从两极分化的源头——土地所有制及其生产关系着手。我们开展土地改

革,将地主土地所有制改变为农民土地所有制,但一家一户个体经济对小农业生产模式的依附关系,注定抗击不了频繁的自然灾害,必然会两极分化,永远不可能使广大农民共同富裕起来。

1951年春,长治地委根据比较深入和全面的社会调查,写出《土地改革后农村新的阶级关系及各阶层思想变化情况》报告,内容包括农村新的阶级结构、各阶层土改后的土地变化、各阶层的经济生活状况、各阶层群众对发展生产的看法和要求、群众的要求和反映以及思想意识的变化五个部分。其中对辖区“霞庄、洪井、下村、苏峪、川底5个村卖地情况进行了调查,土改后5个村共有卖地户96户,计:新中农61户,占63.5%;老中农31户,占32.3%;贫农4户(其中有2户系旧富农下降),占4.2%。共卖出土地284.11亩,其中新中农占65.2%,老中农占31.2%,贫农占3.2%。这说明新中农刚翻身,基础还不牢固,还经不起风吹雨打。有的富裕农民占有的耕地超过本村人均耕地一倍或几倍。有的富裕农民买不到地就放高利贷,公开说:‘人赚钱累死人,钱赚钱发大财。’其年利率高达60%至180%。1951年春,长治地区新富农已占总数的0.8%,中农下降为贫农的占13.7%。”(参见中共长治地委调查组1951年春《土地改革后农村新的阶级关系及各阶层思想变化情况》报告,转引自王谦:《劫后余稿》,山西人民出版社,1995年,第142页)

当时农村两极分化的苗头和趋势比较明显,农民分化速度很快,这是一个方面。另一个方面,山西农村在共产党的领导下,互助组不断发展,提高一步的农业合作社应运而生。农业合作社土地入股,地四劳六,有公积金,走集体化道路的因素,社会主义共同富裕的因素不断增加。毛主席看到了这些,认为共产党不断扶持这些社会主义因素,就可以避免农村的两极分化,并带动城市,过渡到社会主义。

这些年,我经常翻看过去的工作笔记。1953年毛主席在谈过渡时期总路线时特别强调,社会主义因素是可以逐年生长的。关键是不能放任自流,要有目的地引导。对农村互助组也不能放任自流。

主席说,我们的路线是确保私有财产还是社会主义?我们是社会主义路线。自愿互助合作,就不是确保私有财产。私人资本家自愿搞国家资本主义,也不是确保私有财产。我们今天的路线就是联共党史(即指《联共(布)

党史简明教程》)第九章到二十二章的路线,故学习这几章有现实意义,当然要联系我们的实际。

我们在农村中,不要搞自流,自流的结果只能剩下资本主义。我们党内是有两条路线的。过去土改时的路线是依靠贫农,团结中农,中立富农,有少数的个别的消灭地主,把地主所有制变为农民所有制。这是革命在全国还没有胜利时的路线。今后的路线是逐步过渡到社会主义的路线。(引自陶鲁笏 1953 年 9 月 27 日华北局会议原始记录笔记)

毛主席讲的这条过渡到社会主义的路线,就是过渡时期总路线。这条路线充满着唯物主义辩证法。世上万事万物都不是静止的,新中国成立后,资本主义因素和社会主义因素也不是静止的,如果我们对农村放任自流,不提倡社会主义,资本主义因素一定会不断发展,因它有自发性。这不是我们嘴上说不搞资本主义就能行的,它要靠执政党的社会主义路线所决定。毛主席一生翻来覆去讲党的路线,他老人家走了这么多年,我才慢慢懂得了。新中国不能搞资本主义,要走社会主义道路,这是我党的宗旨、历史、构成所决定的,是我党对人民对无数牺牲烈士的承诺。当然,也是全党和全国政协会议各党派的共识。周总理在谈“人民政协共同纲领草案的特点”时对此有专门解释。周恩来说:“大家同意中国前途,才会真正承认它,并愿意全心全意为它而奋斗。所以现在暂时不写出来,不是否定它,而是更加郑重地看待它。而且这个纲领中经济的部分里面,已经规定要在实际上保证向这个前途走去。”(《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》第 1 册,中央文献出版社,1992 年,第 16~17 页)什么是社会主义,党内那时很明确,就是不能搞两极分化和以资本剥削人。这就代表和保护了绝大多数人民的利益,相对贫穷的人是绝大多数嘛!

记得毛主席这次讲话后不到一个月,我又被通知到北京。那一年我 36 岁,已被任命为山西省委第一书记,到北京参加会议比较多,养成了大小会议必做详细记录的习惯。我的工作笔记上写的是 1953 年 10 月 17 日,华北局召开会议,传达 10 月 2 日晚中央政治局关于统购统销的扩大会议情况。在 10 月 2 日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,陈云作主题报告,毛主席发表重要讲话,主要内容在《毛泽东传》和《陈云传》中有所披露。小平同志在那次政

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也作了重要讲话。邓小平、邓子恢、习仲勋、高岗、饶漱石到中央前的职务分别是西南局第一书记、中南局第二书记主持中南局工作，西北局第二书记、东北局第一书记、华东局第一书记。都是1952年下半年至1953年春，从各中央局调到中央工作的同志。当年所说的“五马到京，一马当先”就是指他们，有人说“一马”指高岗。其实不然。这五个人中惟有邓小平一个人，毛主席要求在10月2日政治局扩大会议作重要发言，可见，毛主席对邓小平的信任，那个时候就超过了高岗。华北局传达小平同志这次政治局扩大会议讲话，我做过详细记录。

小平同志：主席又谈了农业和手工业改造（指毛泽东同志1953年10月2日晚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讲话），又批判四大自由，说，从法律上说土地出租出卖是不犯法的，从工作上思想上应当做到不出租不出卖，什么人要卖地，什么人要出租呢？当然是穷苦人。没有普遍的农业社，不能解决这个问题。有了农业社，就可以消灭土地自由买卖。将来就叫农业社，不一定要叫集体农场。鳏寡孤老要出租土地，但从工作上思想上也要做到不出租，这就要有更大型的农业社，才能解决。国家不能完全解决贫困户，只有农业社才能解决。贸易自由也要允许些，但从工作上思想上我们要过渡到社会主义，要一步步代替之，水果、肉类、菜蔬等，我们都要干。

借贷自由，农村卖青苗可能有，我们要用预购的方法来消灭之。还有供销社信贷部。四大自由，实际是不自由的。确保四大自由，就是不增加社会主义因素。这就使农村资本主义之尖越冒越高，不可遏止，过渡时期是剧烈的深刻的斗争，粮食问题也是要进行这样的斗争，这个斗争包括对农民自发势力的斗争，这是对农民消除走资本主义因素的斗争，至于对农民互助合作的社会主义因素，我们是要扶持的。主席要我们在一切工作中注意防止资本主义因素。

小平同志在这次讲话中，将粮食问题上升到路线的高度，讲了“冒尖”问题、粮价问题、相互间关系及共同富裕问题。他当时紧跟毛主席部署，继续说道：

这次粮食会议（指1953年10月2日晚中共中央政治局关于统购统销扩大会议）不只解决了粮食问题，主要解决了路线问题，将小农经济纳入了

国家计划之内，即纳入了社会主义道路之内，而不使其走资本主义道路。这不能太急躁了，要一步步去做，要鼓励农民冒社会主义之尖。要向农民打进社会主义（思想），苏联农民自己买汽车，这不是走资本主义道路所能做到的。要使农民走社会主义道路，没有互助合作和征购制不行，解决了粮食问题同时解决了社会主义道路问题。

资本主义是大鱼吃小鱼，我们是要贫农一起富裕。故只有走社会主义道路，对中农要斗争其资本主义因素。粮价高是否对所有农户好？肯定只有对余粮户好。最后有的农民要吃亏了，灾民、缺粮户、一部分开始卖一部分粮，随后又买回来的。保护农民利益，提出粮价提高要补助一下，对谁有利？农村中对冒资本主义之尖的要斗争，在粮食价格中，表现社会主义因素与资本主义因素的斗争。粮价高了，不仅不利于一部分农民，也不利于城市。国家对现在粮价不得不高些，要承认这个现象。我们要在总路线灯塔下行动。农民有冒社会主义之尖的积极性，也有冒资本主义之尖的积极性，我们要鼓励其前者。为了保障国家建设，实行征购制，就可保证物价永远稳定下来。（参见陶鲁笏工作笔记 1953 年 10 月 17 日传达记录）

小平同志当年宣传毛主席关于统购统销与农民走集体化道路的关系、与稳定物价的关系、与避免两极分化不提倡四大自由的关系，讲得井井有条，清晰透彻。有的地方还有所发挥。记得刚解放不久，全国曾经有四次较大的物价方面风潮，指 1949 年 5 月北京的银元风潮、1949 年夏上海的粮食风潮、1950 年春节前后上海纱布风潮、1950 年 5 月紧缩财政金融风潮。政府依靠全国一盘棋重拳整治取得了胜利。毛主席大力提倡农业合作化，实行统购统销政策，一直到毛主席去世，全国物价再没有什么大的波动。人民的生活虽然不富裕，刚建设社会主义，没有家底嘛；但确实比较安定，社会安定，人心安定，没有出现两极分化，这对新中国站住脚跟具有根本意义。

毛主席始终坚持农业合作化，反对两极分化，反对任何损害农业合作化集体化的苗头。记得 1962 年毛主席在北戴河中央扩大会议上仍然讲：“单干势必引起两极分化。两年都不要，一年多就会出现阶级分化。其中有的还是共产党的支部书记，贪污多占，讨小老婆，放高利贷买地；另一方面是贫困农民破产，其中有四属户（指军、烈、工、干四属——笔者注）、五保户，这恰

恰是我们的社会基础，是我们的依靠。我们要代表贫下中农，也代表一部分富裕的农民，所以要按劳分配，平均分配的不能太多。”（《毛泽东传》，中央文献出版社，2003年，第1242页）

毛主席说话是非常有个性特点的，这里说的一两年就两极分化，不是指具体时间，而是强调时间较短。你送我的《前奏——毛泽东1965年重上井冈山》书里，也讲到毛主席当年这个思考。我在这里作了记号，在此指毛泽东1965年5月在井冈山茨坪说：我为什么把包产到户看得那么重，中国是个农业大国，农村所有制的基础如果一变，我国以集体经济为服务对象的工业基础就会动摇，工业产品卖给谁嘛！工业公有制有一天也会变。两极分化快得很。帝国主义从存在的第一天起，就对中国这个大市场弱肉强食，今天他们在各个领域更是有优势，内外一夹攻，到时候我们共产党怎么保护老百姓的利益，保护工人、农民的利益？！怎么保护和发展自己民族的工商业，加强国防？！中国是个大国、穷国，帝国主义会让中国真正富强吗，那别人靠什么耀武扬威？！仰人鼻息，我们这个国家就不安稳了。”（拙著《前奏——毛泽东1965年重上井冈山》，当代中国出版社，2006年，第151页）毛主席在1964年底和1965年初在中央工作会议上，多次讲过这个思考。这个思考包含着毛主席当年大力提倡农业合作化的根本出发点。

我们中国共产党要坚决反对和不断堵截两极分化的苗头及趋势，才能获得长治久安的阶级基础和社会基础。毛主席要求我们党，永远代表绝大多数人的利益来思考和决策问题，人民才会看到了希望和将来，心理比较平衡，社会比较平衡。在毛泽东时代大多数人还是很穷的，社会比较稳定，社会环境和自然环境比较安全，食品不多，但比较安全，道理就在这里。如果不是这样，农村迅速两极分化后，城市也会两极分化，重新出现地主和资本家是很有可能的，唯利是图污染党内外大环境也是可能的。

毛主席当年大力提倡农业合作化，首先抓住了这个根本点，构筑了整个大战略。

二、提倡农民互助合作积极性与农业社优越性相结合，平原建设与山区建设相结合，全面发展

笔者：毛泽东大力提倡农业合作化，反对两极分化和资本主义，这是与我党当年宗旨相一致的。但如何获得广大农民的真心拥护，将其长远利益与眼前利益相结合，农业合作化体现了哪些特点呢？

陶老：这正是当年农业合作化搞得比较突出的地方。具体回顾，首先是引导农民互助合作的积极性与农业社的优越性相结合，因地制宜，多种经营。早在1951年12月，毛主席批准《关于农业生产互助合作的决议（草案）》，就明确指出：“要肯定农村个体经济和劳动互助两种积极性”，“同时要反对党内两种不同的错误的倾向。一种是消极的右倾错误思想，一种是急躁的左倾错误思想”。“党中央的方针就是根据可能的条件而稳步前进的方针。党在各种不同地方的农村支部，应该在党中央这种方针的指导下，教育自己的党员积极地分别参加这些不同的农业互助和合作。”（《农业集体化重要文件汇编》（上）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，1981年，第37、40页）

正是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的积极作用，农业合作社本身具有的优越性更加突出。就以我任职的山西为例吧。1951年，长治试办的10个农业合作社取得了很好的成绩，带动了山西全省农业社迅速发展起来。1953年，山西全省共办了2242个农业生产合作社，农业社粮食种植面积共85.2万余亩，总产量共8759.74万公斤，超过1952年总产量6873.625万公斤的27.6%；1953年每亩平均产量101.5公斤，较1952年每亩增产22公斤，超过当年当地一般常年互助组每亩平均83.5公斤的21%，超过当地一般个体农民每亩平均73公斤的39%。1953年全省农业社的棉田共2.7万亩，总产量共255.6万公斤（籽棉），超过1952年总产量204.25万公斤的20%；1953年每亩平均产量94.5公斤，较1952年每亩增产19公斤，超过1953年全省每亩平均69.5公斤的35.8%。1953年农业社在发展副业和有条件地区发展林业和牧畜业等方面，都取得了很大成绩。全省农业社的副业收入为108亿元，约占总收入的8%左右。1953年营造防风林带4条，约400余亩，成活率达98%以上，畜牧的收入约值18万公斤粮食。农业社不仅多打

了粮食,95%以上的社员增加了收入。(参见《中共山西省委农工部关于全省1953年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基本总结》,山西省史志研究院编《山西农业合作化》,山西人民出版社,2001年,第126~127页)

当年在全国较大的范围内,农业合作社不仅增加粮食增加收入,同时提倡因地制宜,发展林业、畜牧业。山西平顺的西沟农业合作社,当时便是全国瞩目的这方面典型。西沟是上世纪50年代的“大寨”。李顺达是全国第一届农业劳模。毛主席多次接见他。1950年9月26日是中秋节,中央领导同志和第一届全国劳模一起吃饭。李顺达和工人代表马恒昌坐在毛主席左右。毛主席说:“中国山地很多,南方有井冈山、大别山,山西有太行山、吕梁山,就是到了共产主义也不能不要山区。你们住在山区,要好好建设山区,以后要把山区建设成社会主义新农村。”席间毛主席举起酒杯敬李顺达说:“你住在太行山上,那个地方石厚土薄,你做出了贡献,我敬你一杯。”(参见《西沟村志》,中华书局,2002年,第5页)在全国解放初期,毛主席多次说:山区生产很重要,解放后很贫穷。老区人民可能有些怨言。组织老区访问团到北京观礼,这是政治上的鼓励,同时还必须从经济上解决问题。(引自陶鲁笏“1952年12月21日,薄一波在华北局传达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精神”原始记录笔记)毛主席一直把山区建设看得和平原一样重要。李顺达深受鼓舞,决心带这个头。利用山区资源,农林牧全面发展。1954年,李顺达农业生产合作社还将社名改为金星农林牧生产合作社。他们“敢冒社会主义之尖”,对全国影响很大。不要忘记,是毛主席第一个在全国提出发展山区生产,“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”的。

西沟过去是一个不见绿色只见石头的穷山沟,合作化时期农林牧全面发展很不错,集体在山上大面积种树、大批养羊,山西那时是用羊粪施肥的,种中药材,社员都比较富裕,山林生态良性循环。从第一届到现在都是全国人大女代表的申纪兰同志,就是从西沟那个山沟沟里出来的。

农业合作化时期,毛主席重视西沟,已考虑到山区建设要与平原同步发展,强调要向农业生产的深度和广度进军,毛主席在《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》“编者按”中,多次提到“向农业生产的深度广度进军”问题。只有搞农业合作化,农业生产的规模大了,才能有条件向农业生产的广度和深度进

被动局面。

三、引导农业合作化与农业水利化相结合,推动“支部建在村上”

笔者:陶老,毛主席当年推行农业合作化,特别注重引导农业合作化与农业水利化相结合,相互促进,您怎么看这一点?

陶老：毛主席说，“水利是农业的命脉”。在农业合作化和水利化结合方面，毛主席想得又远又具体。毛主席曾经多次与黄河水利委员会、长江水利委员会同志长谈，党内作过传达，林一山（1911—2007），山东省文登人。1936年1月加入中国共产党，曾任北平师大地下党中心支部书记。1949年从事水利工作，任中南军政委员会水利部长兼长江水利委员会主任。在书记会和水利会上作过报告。1953年2月毛主席乘坐长江舰视察，从汉口到南京，在长江舰上和林一山深谈过几次。

毛主席说,解放前中国只有几座水库,要发展农业,必须彻底改变这